

竺道生思想之研究

南北朝時代中國佛學思想之形成

劉貴傑著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人人文庫

二五五
二五五

劉貴傑著

竺二道生思想之研究

——南北朝時代中國佛學思想之形成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人人文庫序

人人文庫創始於民國五十五年七月，創刊之初視字數多寡分爲單號及雙號兩種，五十八年七月起增加特號，迄六十八年十二月底共出版二二五一本，其中單號六五七本，雙號九〇九本，特號六八五本。除六十三年三、四兩月因紙張缺乏暫停外，每月發行十本至二十本不等。

本叢書爲王雲老所創，其選材與介紹新知倣自英國人人叢書 (Everyman's Library) 及家庭大學叢書 (Home University Library)，以廉價普及爲主。今雲老雖已仙逝，不復主編本叢書，本館仍一本雲老遺志，繼續出版，按月發行，並力求革新內容，改進印刷，以副讀者愛護本叢書之雅意。

臺灣商務印書館編審委員會謹識

民國六十九年元月一日

自序

佛教初傳來華，爲誦經禮佛之事，清心釋累之訓。後漢安世高、康僧會倡養生成神之學與道教之煉精化神相似。支讖、支謙主神與道相合，與道家玄理妙道相通。自魏晉始，玄學之理大興，般若之學衍盛，而般若之精諦與老莊之奧義，其探頤索隱，俱達於冥微之境，故有相通之處，是以魏晉以還，佛學隨玄學之發達而漸次深化。

永嘉之亂，名士南渡，高僧亦多隨之過江，因而南方佛學與玄學並盛，互相輝映。般若之學至東晉之末已達極致，學者漸由「空」義而思及「有」義，故有涅槃佛性學之興起。般若學之重心在論證物質世界之虛幻；涅槃學之特質在闡揚精神世界之真實，二者相輔相成，同爲兩晉南北朝佛學思想之兩大系統，而兼綜此兩派教義之高僧，厥爲晉末宋初之竺道生。

道生出自儒門，又通玄學，而對佛學特有神悟，不唯通曉儒道兩家之學，亦且涵泳昆曇、般若、涅槃等佛學義理，以儒道思想與佛家接銜溝通，於涅槃學之持論，獨擅勝義。相傳道生聚石爲徒，宣講涅槃經義，至闡提處說有佛性，群石皆爲點頭（佛祖統紀卷二十六、三十六），故世稱「生公說法，頑石點頭」，時人推之爲涅槃聖，非虛譽也。

綜觀道生攝受儒道之學說，融合「空」「有」之理論，以中國思惟意識轉化印度佛學思想，使之順乎中國傳統，應乎中國人文精神，而能不斷遞遭發展。透過本書即知，道生循儒道之思路，揭佛家之義理，引世事之明徵，詮幽微之妙諦，誠佛門之龍象也。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國慶

劉貴傑序於臺北

目次

第一章 導論	一
第二章 時代背景及其哲學問題	四
第一節 天下大局之淆亂	四
第二節 社會形態之更迭	六
第三節 哲學問題之引生	七
第三章 竺道生思想之學術背景	一
第一節 兩漢經學之衰微	一
第二節 魏晉玄學之衍盛	一三
第三節 佛學思想之流行	一七
第四節 玄佛會通之契接	二三
第四章 竺道生思想之理論淵源	三〇
第一節 道生思想與儒家哲學	三〇

第二節	道生思想與道家哲學	三二
第三節	道生思想與佛家哲學	三六
第五章	竺道生思想之理論基礎	四八
第一節	實相觀	四八
第二節	佛性觀	五三
第三節	感應觀	六〇
第四節	涅槃觀	六六
第六章	竺道生思想之理論特色	七八
第一節	頓悟成佛	七八
第二節	法身無色	八四
第三節	佛無淨土	八七
第四節	善不受報	九二
第七章	竺道生思想之價值意義	一〇一
第一節	開頓悟思想之新境	一〇一
第二節	主理一物殊之觀念	一〇六
第三節	啓澄觀學說之理路	一〇九

第八章	結論	一二〇
附錄	竺道生簡略年表	一二七

第一章 導論

魏晉南北朝時期因政治之淆盪、社會之擾攘、民族之混亂、文化之分崩，可謂我國正統思想之衰微時代。然老莊學說復興，佛學思想漸盛，而有玄學與佛學之匯流，以化解當時思想之沉鬱。而佛學亦因此融入中土學術，逐漸中國化，遂形成中國文化思想中一股巨流。

佛學來自印度，初入漢代之佛學一般人以之與道家之學作同等觀，且與道教形解成仙之說，誦咒祈福之術類似，故學者之著述中，多未談及佛學。漢末支婁迦讖之般若與安世高之毘曇，已露大小乘兩系之端倪，然未有哲學之發揮。至牟子著理惑論，始謂佛道有別，並取老莊思想解說佛理。三國時代，何晏、王弼振起玄風，以「無」爲萬有之本體，而與佛家之「空」義理相通，實則，「空」與「無」皆總攝玄遠之理，故後來形成玄學性之佛學。

西晉盛行「清談」，「清談」即談老莊之玄理，對佛學之發展頗有益助；而維摩詰經之豁達拔俗，機智瀟灑亦促進佛學之清談化，由此二因，而形成西晉清談中立納入佛學。此風至東晉則演爲「格義佛學」（藉老莊術語解釋佛學義理），如竺法雅「以經中事數，擬配外書，爲生解之例，謂之格義」（高僧傳卷四）。繼而，孫綽以「無爲」闡釋佛法，其道賢論又以東晉七僧比擬

竹林七賢，即爲格義之表現。且道安、支遁、慧遠、僧肇亦以老莊詞語講解佛典，慧遠曾引用莊子闡明「實相」之義。支遁之大小品對比要抄序乃藉「道」釋佛，其逍遙遊注則以佛明莊，由此更見玄佛之互融，故佛學中參入玄學，致玄釋相輔相成，並行不悖。

治法顯主譯涅槃，僧伽提婆顯揚毘曇，鳩摩羅什弘傳般若，則佛學思潮日益昌盛，蓬勃流行，而以般若、涅槃二經影響當時教界甚大。竺道生（約三七二年—四三四）即爲兼綜般若、毘曇、涅槃學說之高僧。道生俗姓魏氏，原籍鉅鹿（河北省平鄉縣），後寄居彭城（江蘇省銅山縣），年十歲，即依名僧竺法汰出家，並曾師事提婆與羅什，故能集當時佛學思想之大成，並融攝中國儒道哲學，建構其理論體系，開導南北朝之中國佛學。其「悉有佛性論」與「闡提成佛說」，不唯融會真空妙有之真義，並遙契儒家人人皆可爲堯舜之精神，故可謂兼容並包，綜舊創新之思想家。

基此，本文研究之動機乃在考究玄學與佛學之交涉問題，當設法明瞭佛學進入中國之初，知識份子或佛學人士運用何種思考方式理解佛學問題，亦即希望理解初期佛學思想與中國學說之衝擊，所經排拒與同化，終而形成中國佛學特殊形態之原因。由於研究範圍甚廣，而欲瞭解佛學中國化之問題，首宜分析當時佛教學者之思想，把握其理論基礎及理論特色，始能對玄佛相融之思想有所認知。故僅論究竺道生之思想，透視其在玄學與佛學交融時期，如何以中國哲理會通佛學思想，並謀展現南北朝時代佛學中國化之雛形或中國佛學思想之形成。從而，基於中國文化思想

之廣包性及涵容性，與「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史記）之觀點，探索當今中西哲學交流與中國哲學整建之際，知識份子應有之認識與趣向。

第二章 時代背景及其哲學問題

漢末傳來印度佛學，魏晉復興道家學說，運會所至，促成兩家學術思想之交融，並形成南北朝時代中國佛教思想之雛形——頓悟成佛、法身無色、佛無淨土、善不受報——中國化之佛學思想形態。然時代思想之所以蔚為風尚，與當時之政治、經濟、社會均有密切之關係。而當代思想家所闡釋之哲學義理，均難以擺脫時代所加注之影響力，竺道生亦不例外，唯道生能不受傳統及其時代之拘限而已。

道生為晉末宋初之佛門高僧，亦為融攝「空」「有」兩宗之佛學思想家，而成為南北朝時代最具代表性之中國佛教學者，其所以能倍受後世之推崇，即在其吸收消融儒、道、釋三家思想，並予以綜合創新而成一家之言，且能建構其自家之哲學體系。同時倡言「闡提」具有佛性，及人均能成佛之普遍性問題，並強化儒道思想之堅韌性，與促進佛學思想之普遍化。本章擬略述其時代背景，並據以透視其所引發之哲學問題。

第一節 天下大局之淆亂

東漢末年，外戚專政，宦官跋扈，互爭權勢，造成黨錮之禍。繼而有黃巾之亂、董卓之變，演成群雄割據之局，致使東漢滅亡。赤壁戰後，三國鼎立，迨晉統一天下，復有八王之亂、五胡之亂、永嘉之亂、淝水之戰、孫恩之亂、桓玄之亂、盧循之亂等等此乃魏晉南北朝政局之演變情勢。政場之傾軋愈趨激烈，則朝廷愈失威信，以致野心政權之輩，趁機謀反；草野無賴之徒，乘隙爲寇，於是兵禍瀰漫，天下大亂。尤其漢末黨錮之禍，方正之士多遭慘害，妻離子散，流亡邊塞。後漢書黨錮傳謂「黨錮之禍，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繼而曹氏篡漢，司馬篡魏，禍亂愈烈，執政當局，猜忌陰狠，迫害賢良，如孔融、楊修等之死於魏；嵇康、陸機等之死於晉，眞乃魏晉「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晉書阮籍傳）。加以內則八王之亂，外則五胡內侵，內亂外患交加，且天災流行，旱雹地震、大風大水，民生困苦，盜賊公行，人命土芥。永嘉四年，荒饑至極，殿內死屍交橫，民間餓殍遍野。政場險惡，災難慘烈，無可如何，德慧之士唯清虛寡欲，逍遙林泉，苟全性命於亂世而已。

天下混亂，百姓自然陷於困苦之中，而當時尚有賦稅、徭役、土地等經濟問題，以增加民瘼之嚴重。漢末動亂，原以錢幣代繳租稅，或藉之免除徭役；曹魏則以綿絹帛粟等實物取代稅收；晉代之後乃由人民直接應役；南朝賦稅過重，百姓不堪負擔，貧者出賣妻兒或自縊身亡者不乏其人。至於土地方面，雖晉代有占田制度，然民衆並未獲益，復因晉室之南遷曾藉助於世族，故唯坐視豪門之兼併土地。於是農業大衰，經濟蕭條，加以連年蝗旱，漸至民不聊生，甚有採食草葉，

以苟延殘生者。經濟無法穩定成長，民生未獲安全保障，人民微賤，蒼生痛苦，故而人人思慕佛老之學，以求心靈之寄託。

第二節 社會形態之更迭

漢代崇尚儒術，官吏多以經學起家，習經弟子各有師傅，累世相傳，歷數百年而不墜。且郡國之察舉與朝廷之徵辟，大抵復以瞻富經學爲上選，故由累世經學而形成累世公卿。東漢中期以後，累世公卿之家日多，如宏農楊氏，四世爲三公；汝南袁氏，四世六人官至三公。此種士大夫之傳襲勢力，造成所謂「門第」世家，而南北朝之世族門閥即胎胚於此。

曹魏之時，察舉與徵辟漸重門第，既不重真才實學，復不論品格道德，魏文帝時，推行「九品中正官人」，其意乃在謹慎選士，以矯漢末濫薦之弊，然官品之升降，大都憑藉「世資」，久而久之，即造成「公門公有，卿門卿有」、「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之社會，且門閥享有特權，世代爲官，雖無封建之名，而有世襲之實，形成不平等之社會現象。

晉室司馬氏，亦出自名門望族，故常維護世族之利益，使世族門閥成爲政治與社會之特殊階層。永嘉之亂以後，中原雖已淪陷，然其勢力仍舊存在。東晉王室在江南立國，即有賴於世族門閥之支持，故此益受朝廷之重視。東晉以後，門閥業已制度化。渡江而南之中原閥閥巨室，以謝、袁、蕭等姓爲大，稱爲「僑姓」，自視頗高，多居朝廷要位。東南原有之世族，以朱、張、顧、

陸等爲大，稱爲「吳姓」，地位不及「僑姓」。北方世族，則自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後，始仿南朝釐定制度。由此可知，東晉南北朝時代，世族已發展成具體而完整之社會階層。

總之，魏晉南北朝時代之世族門閥均有其特殊之地位與權勢，非寒士所能企及。就政治而論，世族壟斷清流之職，位高而事不煩。門第愈高，官職愈高。世族累世顯貴，優先任官，平流進取，坐至公卿。就經濟而論，世族得免徭役，坐享俸祿，擁有大量之土地，雄厚之財力，並藉政治勢力任意封山佔澤，據有廣漠之莊園，經營各種產業而壟斷金融市場。就社會而論，世族之社會地位固定，門第如不相等，則不通婚姻；世族在高層，不與庶人相交；其身分不相當者，甚至不與同坐，世族得各募部曲，稱爲「義從」，庶人爲求進身，每每自附世族，名爲「門生」，由是而形成階層不平等之社會風尚。因此，低階平民均極力謀得精神之展揚與平等。

第三節 哲學問題之引生

魏晉南北朝社會存有嚴格之階層劃分形態。世族階層與門閥制度造成一般平民之痛苦，並剝奪庶人之政治地位、經濟地位與社會地位，於是形成不平等之社會現象。平民一切均以自家門第之高低爲決定因素，富貴者固不會低賤，而低賤者亦永遠不能富貴。在此政治局勢、經濟現象、社會形態之下，終於引發有識之士之深思：階層既有高低，門第復有貴賤，然則，「人性」是否亦有高低貴賤之別？門第之貴賤既已命中註定，然則成聖成賢是否亦出於天生？人生之痛苦與無

奈是否可以解脫？此乃魏晉南北朝人士所急欲解決之問題。雖先秦儒家思想早有「人皆可以為堯舜」之啓發，然漢末魏晉以來，「聖人不可至而不能學」之觀念亦已普遍流行。所謂聖人不學而自知，無師而自達，乃賢者所不及，實因「聖人卓絕與賢者殊也」（論衡實知篇）。魏王弼云「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何邵王弼傳），晉向秀、郭象謂「法聖人者，法其迹耳」（肱篋注），「及至聖人，猶云及至其迹也」（馬蹄注）推此二人之說，自可得聖人不可學而不能至之結論。謝靈運亦云「孔氏之論，聖道既妙，雖顏殆庶」（辯宗論），意指儒家立義凡聖絕殊，妙道彌高彌堅，乃凡夫所不能至，即如顏回之大賢，亦只能幾近聖人，然卻不能及夫聖人。而魏晉南北朝之時，世族階層大多公認聖人不可至且不能學，貧賤者非但於物質生活不能有所改變，即使在精神方面亦無法企及聖人之境。因此由貧富貴賤、聖凡雅俗之社會問題引出「聖人是否可以學而可以至」之哲學問題。此問題一直流行於魏晉南北朝之學術界，而歷久不衰。另外，晉末六卷泥洹經譯出，載明「闡提不能成佛」之說，此說否定斷善之人有成佛之可能性，恰與當時中國學界所重之「超凡入聖乃不可能之事」不謀而合，由此匯成一無法自我超越之意識形態。

綜上可知，竺道生所面對之時代背景，因而決定其哲學思想問題。在「聖人不可至而不能學」、「闡提不能成佛」，及世族門閥制度所局限壓抑之情態下，一代高僧道生法師，勇於揭示「一切衆生悉有佛性」及闡提可以成佛之卓見。此一卓見或理論在否定「聖人不可至而不能學」之觀念，而提倡人性平等無差，人性既平等無差，則人人皆可成佛作聖。其實，得道作佛，成聖成賢，

既不論階層之高下，又無視門第之貴賤，全憑個人之努力奮發，持之以恆，則必能終底於成。「佛性」爲一切衆生本有之眞性，佛性或眞性即是人性，因「迷」與「悟」之不同，而有佛性與俗性之差異，或聖人與凡夫之區別，且成佛亦非離開人性而另外有佛性可得。此人性或眞性既非堯舜所特有，亦非桀紂所絕無，是以聖人與凡夫畢竟無異，而人人皆有佛性，人人均能成佛之思想即是人性之解脫與昇華。故道生謂「一切衆生，莫不是佛」（法華經疏），破除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之不平等，抒解平民之精神痛苦，啓導衆生追求幸福極樂之境，使一般民衆獲得安身立命之所，足證其已發揚佛陀同體大悲、慈祥濟世之博愛精神。實則，世亂紛擾，無可如何，況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時歟！覩顏鑽營，謀求富貴，君子所不爲也；悖禮犯義，自食惡果，亦賢者所不爲也，賢人君子唯樂天知命，窮理盡性耳。且人之可貴者，乃在道德之實踐，品格之涵養。孟子謂「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告子）。天爵在人善性之中，此天所賦予之尊貴也，人人皆可修而得之。人爵則須待機而致，非可妄求，故唯天爵乃爲永恆不變之尊榮。人生之價值即在天爵之顯發；庶民之能與王侯分廷抗禮，亦在此天爵良貴而已。子張云「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乎行之美惡」（莊子盜跖），故唯賴仁德之潤澤，始有真切之生命，並應順天理之自然，守無爲之大道，以提高人生境界。因之，道生體會人人皆有佛性，闡提亦能成佛，此佛性人人本有，不待外求，實已啓沃衆生無須自暴自棄，甘墜下流，而應自保良貴，修其天爵，以期生命之提昇與精神之挺立。